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源泉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共同体三元结构论视角

李维意, 闫淑珊

摘 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了富有时代精神和世界意义的共同体实践。“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方式决定着共同体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国家主体化主导的专制霸权和资本垄断化主导的资本逻辑, 揭露了“虚幻的共同体”的内部分裂和危机关系。劳动社会化的发展蕴含颠覆资本统治的力量, 劳动社会化和生产资料集中的矛盾是推动“真正的共同体”建构的动力机制。劳动只有借助国家力量才能重新驾驭“物的力量”, 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 剥夺剥夺者, 大力发展生产力, 为建构“真正的共同体”创造条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恩格斯劳动社会化主导社会共同体实践理念的传承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断巩固劳动主体地位, 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坚持发展资本、规范资本, 提高驾驭资本的能力, 推动劳动社会化的当代建构; 坚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倡导共建共赢共享, 大力推动经济全球化,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家主体化; 资本垄断化; 劳动社会化; 三元结构论

中图分类号: A811.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22)03-0001-10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2.03.008

社会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之一。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社会共同体的“人体解剖”和“猴体解剖”, 不仅揭示了社会形态历史演变的一般规律, 而且阐明了社会共同体“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的内在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并阐发了社会共同体“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 分析研究了“国家”“资本”“劳动”在社会共同体发展中的地位 and 作用, 首倡劳动社会化主导“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的社会共同体实践发展道路。马克思、恩格斯立足劳动社会化立场, 深刻批判了国家主体化主导和资本垄断化主导的社会共同体实践, 揭露了“虚幻的共同体”的内部分裂和危机关系。劳动社会化主导社会共同体实践发展道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源头活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劳动社会化主导“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社会共同体理论的传承与发展, 是马克思、恩格斯“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出场方式, 是破解世界全球性危机和国际关系冲突的中国方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马克思空间哲学研究”(19FKSB024); 河北省研究生创新项目“马克思劳动社会化思想研究”(XZZBS2022010)

作者简介: 李维意, 河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lwy1031@126.com (河北保定 071002); 闫淑珊, 河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基于三元结构论的社会共同体解剖与批判

“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共同体“人体解剖”和“猴体解剖”的重要理论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共同体的理论探索经历了围绕国家问题的社会共同体研究阶段、针对资本逻辑的虚假共同体批判阶段和立足劳动立场的真正共同体建构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探讨了“国家”“资本”“劳动”在社会共同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最终确立了劳动社会化主导社会共同体发展的理论立场和价值取向,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共同体“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与社会形态的“生产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层结构论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立足劳动社会化主导社会共同体实践立场,批判了国家主体化主导和资本垄断化主导的社会共同体实践,完成了他们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理论夙愿。

(一) 解剖市民社会:从二元结构论到三元结构论

马克思大学毕业刚刚踏上社会的《莱茵报》时期,主要关注的是国家问题。在对国家问题的思考中,马克思确认了市民社会的意义,正确解决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黑格尔是最早关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问题的思想家。他认为,市民社会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和“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1](P351)}。市民社会是人们之间需求与满足关系得以实现的基础,但由于市民社会建立在财产私有基础之上,导致了不平等的扩大。为此,需要运用国家权力解决市民社会的冲突,即借助国家力量规制市民社会。黑格尔看到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矛盾,但却“满足于这种解决办法的表面现象”^{[2](P94)}。马克思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2](P10)}。马克思、恩格斯把“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3](P544)},迈出了创立唯物史观的关键一步。马克思转向市民社会批判之后,并没有忽视国家问题的研究。市民社会追求私人利益至上,剥削成为正义,最终导致社会分化。基于市民社会的国家致力于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马克思从人类社会立场出发,强调国家必须妥善处理市民社会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既要代表资本利益,更要代表公众利益。然而,现代国家却成为“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4](P33)},政府变成了“本国状况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5](P628)}。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国家肩负着双重职能,一是经济职能,即政治为经济服务;二是社会职能,“即通过对内对外的政治职能,国家确保社会生活的安全稳定和发展”^{[6](P106)}。现代国家造成了资本与劳动的尖锐对立,因而是必然被颠覆的“虚假的共同体”。

在解剖市民社会之前,马克思形成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论,确立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理论立场。在解剖市民社会基础上,建构了“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谈到,为解决“苦恼的疑问”,潜心解剖市民社会且得到了“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批判黑格尔的国家观,确立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理论立场,看到“具体劳动的等级……是市民社会各集团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石”^{[2](P100-101)},初步确立了劳动在社会共同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个“结果”是“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4](P591)},这个“总的结果”“带有哲学方法论性质”^{[7](P1)}。从第一个“结果”向“总的结果”的过渡,经历了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第一次解剖,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围绕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解剖市民社会,把劳动异化理解为社会共同体异化的根源,发现了劳动在社会共同体建构中的基础地位和关键作用,强调“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2](P310)}。马克思不仅探讨了市民社会内部资本与劳动的分裂,而且注意到国家对于资本与劳动关系的重大影响。资本之所以能够实现对劳动的剥削

与压迫,凭借的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权力。资产阶级把自身的财产私有权力提升为政治统治权力,其结果为,“人的独立性”深陷于“物的依赖性”,造成了社会共同体的内在分裂和危机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升华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资本与国家”的关系升华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同时,把劳动理解为社会历史的基础意味着把无产阶级作为建构劳动社会化主导“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社会共同体发展的主体力量。

(二) 国家主体化主导社会共同体实践的批判

国家主体化主导社会共同体实践是“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的历史形态之一。三元结构中,国家主体化占据主导地位,意味着国家权力成为社会共同体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其结果是走向专制霸权的社会共同体实践道路。它的特点是,官僚机构膨胀,政治权力操纵和压抑资本自由,劳动受到国家权力的宰制和资本力量的盘剥,市场化难以推进、现代化迟滞不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西方社会前资本主义时代经历了“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它们都是“以一种共同体为基础的”^{[3](P521-522)}。现代化的过程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取代传统共同体的过程,但是,由于古典古代或封建等级共同体中国家权力过分膨胀的历史格局没有被根本打破,它们借助工业化的力量重新膨胀起来,压抑和操控资本,剥削和宰制劳动,造成市场经济、现代社会结构无法自由生长、充分发展,最终导致片面、畸形的社会共同体实践——“以强化专制国家、霸权主义为主旨的现代化道路”^{[8](P44)}。在这种社会共同体中,国家作为主体力量主导着社会共同体的发展方向,资本和劳动受到国家权力的操控。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由50多万人组成的官吏大军绝对地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人们的生存,极端的中央集权无处不在。法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物质利益,在庞大的国家机器中安插自己的人口,与这个国家机器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马克思指出:“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4](P565)}国家主体化主导社会共同体实践的结果是借助政治权力打压资本、剥削劳动,维护专制统治、追求霸权主义。这种国家主体化主导的社会共同体实践是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德国国家主体化主导的社会共同体实践给予了无情鞭笞。马克思区别了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国家“却随国境而异”,并指出靠现代国家的帮助建设一个新社会不过是“拉萨尔的幻想”^{[9](P371-373)}。针对沙皇俄国的专制霸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给予了深刻剖析和批判。马克思看到,在俄国社会共同体发展中,国家利用政治权力帮助资产阶级,牺牲农民利益,最终导致俄国“农业公社”解体。俄国“农业公社”的孤立、与世隔绝使其软弱无力,矗立在“农业公社”之上的是“比较集权的专制制度”,国家不仅“借助集中在它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来不断地压迫公社”,而且“靠牺牲农民”培植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帮助吮吸“农业公社”血液的“新资本主义寄生虫去发财致富”,而“在国家帮助下靠牺牲农民哺育起来的资本主义是同公社对立的;它所关心的是公社的毁灭”^{[10](P436-446)}。俄国国家主体化主导的社会共同体实践,是国家权力与资本联合起来共同压迫和剥削劳动,这种联合突出政府的作用而忽视市场的作用,其结果必然是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遏制。

(三) 资本垄断化主导社会共同体实践的批判

资本垄断化主导社会共同体实践是“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的现代典型形态,是资本主义制度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垄断化主导社会共同体实践表现为资本绑架国家,资本上升为至高无上的能动主体,它通过经济垄断,操控国家、宰割劳动而实现增殖,它借助工业化和市场化而实现强制进步。资本在由初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发展中,逐步占据垄断地位,通过绑架国家、宰制

劳动实现了价值增殖最大化。在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基础上,资本垄断化重构了以“主导-依赖”为特征的全球社会空间。一方面,资本通过推动劳动社会化和交往普遍化,加速了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资本积累的全球空间建构成世界资产阶级与世界无产阶级的尖锐对立,“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P36)}。资本垄断化主导的社会共同体实践把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普遍化、尖锐化,暴露出资本的野蛮及历史局限性。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秘密。资本家垄断劳动条件,用较低价格购买劳动力,从而获得无偿占有剩余劳动的社会权力。资本垄断化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实践推动了经济市场化、劳动社会化和交换普遍化。马克思指出:“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11](P198)}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终结了封建的等级共同体。“资产阶级……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4](P32-33)}资本垄断化主导社会共同体实践发挥了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一方面,终结了人类对于自然力的崇拜,创造了巨大的资本生产力,开创了现代史;另一方面,终结了人类地域发展的历史,开创了世界史。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刻分析了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市场的积极作用。资本成为社会共同体的灵魂,它把一切社会要素整合到社会化大生产之中。“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12](P90)}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就在于重构了它与劳动、与自然、与人的关系,推动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资本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基础、现代市场经济的枢纽和社会共同体的主宰。马克思指出,资本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11](P878)}。“以物为中介”就是以资本为中介,就是把人和人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13](P707)}。资本“支配一切”,就是在社会共同体中,资本不仅剥削劳动而且绑架国家,尤其是金融资本对国家权力的绑架。马克思借自由派银行家拉菲特之口说,七月革命的秘密就是“从今以后,银行家要掌握统治权了”^{[14](P446)}。马克思看到,新成立的共和国“不仅没有推翻金融贵族,反而巩固了它的地位”^{[14](P518)}。

二、基于劳动社会化的社会共同体实践与建构

在“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中,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劳动社会化主导社会共同体实践与建构,突出强调劳动社会化的地位和作用,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劳动社会化主导社会共同体实践必须破除国家主体化和资本垄断化的统治地位,以自由个性的发展为价值指引,围绕适应劳动社会化深度发展的要求,推动社会共同体的现代性建构,最终通过劳动解放实现人的解放。劳动社会化的发展蕴含着颠覆资本统治的力量,劳动社会化和生产资料集中的矛盾是炸毁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地雷,是推动“真正的共同体”取代“虚幻的共同体”的内在机制。马克思、恩格斯把理想的共同体理解为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和解,而在劳动社会化主导下“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社会共同体实践是建构“真正的共同体”的必由之路,即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剥夺剥夺者,为劳动社会化的发展开辟广阔的空间,最终借助“自由人联合体”的力量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国家,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

(一) 劳动社会化主导的三元结构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源头活水是马克思、恩格斯劳动社会化主导“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社会共同体建构理论。王东教授认为,在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之前,劳动与资本、有产与无产的“二元结构”分析框架占主导地位,“国家”只是潜在要素。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

稿》的“五篇构想”到1858年2月致拉萨尔信中提出的“六册计划”,“国家”要素纳入理论框架,形成了“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8](P40)}。然而,“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形成的关键是劳动社会化主导社会共同体建构立场的确立。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确立了“劳动、资本、国家”的三元结构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首倡立足人类社会的新唯物主义,摒弃立足市民社会的旧唯物主义,市民社会是由资本主导的,人类社会是由劳动主导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论证了建构劳动社会化主导“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社会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现代国家是与这种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3](P583-584)}资产阶级借助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力量,冲破传统共同体的羁绊,建构了服从于资本增殖的市民社会。资本与国家的结盟成功地把劳动生产力转化为资本生产力,极大地推进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但是,对于劳动者而言,资本垄断化主导的社会共同体是“虚假的共同体”,取而代之的将是体现劳动力量和劳动者利益的“真正的共同体”,由此,劳动者“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3](P571)}。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回答了实现劳动社会化主导,用“真正的共同体”取代“虚假的共同体”的条件,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剥夺剥夺者,并且运用国家权力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消灭私有制。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完善了劳动社会化主导的“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在马克思的“五篇构想”中,劳动是起点范畴,资本是中心范畴,国家是补充的基本范畴。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把“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13](P1)}作为考察资产阶级社会的逻辑结构。前三项属于资本论,后三项属于国家论。“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都与国家的作用密切关联,同时,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只有站在国家的高度才能正确理解,或者说,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中,国家权力对于资本与劳动关系的世界历史性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是把握马克思唯物史观、现代史观和世界史观的一把钥匙,是马克思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只有坚持劳动社会化主导,才能有效支配和合理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最终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跨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劳动社会化主导社会共同体实践的生动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劳动社会化主导“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源泉。

(二) 建构“真正的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和主体力量

共同体是个人的社会存在方式。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P501)},人的社会关系本质归根结底是通过劳动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质的现实呈现。劳动不仅具有社会关系的性质,而且具有“生命活动的性质”^{[3](P162)}。劳动社会化的基本方式是对象化、关系化。人通过劳动在自己创造的对象性、关系性世界中直观自身、确证本质。劳动也是共同体本质的确证方式。劳动通过对象化、关系化实现个人的自我确证和个人之间的相互确证。劳动对象化使人由个体性存在转化为关系性存在,而共同体是人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表征。共同体是“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15](P13)}。共同体异化是劳动异化的现实表现。“真正的共同体”必须扬弃劳动异化。以自由劳动为基础才能建构“真正的共同体”,并且彰显人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3](P571)},才可能获得全面发展的手段。劳动发展史决定共同体发展史。共同体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基于某种劳动形式而结成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劳动形式是劳动社会化的方式。考察共同体的历史必须抓住劳动形式的历史演变。

劳动社会化是人类存续发展的基石,是个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过程。“人与人之间由于劳动而形成置身性的社会关系”^{[16](P35)}。马克思共同体建构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

类”^{[3](P506)}。“虚幻的共同体”是劳动社会化发展的产物，因而它必然随着劳动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而被扬弃。只有人类的“劳动本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化的时候，一个人的剩余劳动成为另一个人的生存条件的关系才会出现”^{[11](P585)}，此时，劳动社会化成为建构资本剥削劳动关系的基础。机器大工业对工场手工业的否定，推动劳动社会化突破民族历史的阈限而进入世界历史，其结果，劳动社会化转化为资本社会化，劳动成为资本任意宰制的对象。劳动社会化蕴含着人类主体性、对象化的本质力量，劳动社会化的发展是永不停歇的，它孕育着冲破“虚幻的共同体”桎梏的物质条件和主体力量。劳动社会化的发展是“真正的共同体”扬弃“虚幻的共同体”的现实依据。“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11](P874)}在劳动社会化基础上建构“真正的共同体”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主旨，劳动社会化的指涉场域是置身性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秘密在于劳动社会化淹没在资本社会化场域。马克思的“人体解剖”透析了资本社会化场域的“物化-异化”逻辑，从“物的社会化及其逻辑”“物的社会关系体系”“物的‘金锁链’系统”“对真实历史主体的遮蔽”等方面^{[16](P36)}，揭露了物世界、物体系对活劳动的统治。

（三）重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通过劳动解放走向人的解放

社会共同体是基于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社会关系体。社会共同体研究关注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社会共同体是“构成一定共同体的主体之间的关系”^{[17](P59)}。马克思从共同体的劳动社会化根基出发，揭露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虚幻性，“虚幻的共同体”是建立在异化劳动基础之上的，存在着个体与共同体的危机关系，尤其是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导致类的分裂。恩格斯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13](P70)}从“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看，劳动和资本是社会共同体的基本构成要素。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直接决定着它们与国家的关系。资本垄断化主导，国家将成为有利于市民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政权；劳动社会化主导，国家将成为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无产阶级政权。资本垄断化主导的社会共同体解放了资本，却囚禁了劳动；劳动社会化主导的社会共同体，将借助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重新驾驭资本，从而为劳动解放创造条件，而劳动解放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关键环节。

马克思对社会共同体问题的解决基于对人的本质的科学理解。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采用实体或直观的思维方式，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马克思则认为，必须把人置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从现实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把握人的本质。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是一种对象性存在物，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是一种关系性存在物。“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3](P164)}。从现实的“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中去把握人的本质意味着在社会共同体中把握人，因为社会共同体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和确证方式。

个人作为社会共同体的存在意味着他不仅是置身性、事实性的存在，而且是关系性、价值性的存在。在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物的关系制约着人的关系，资本物成为社会共同体的统治力量，资本借助国家权力压迫和剥削劳动，最终导致社会共同体的异化。那么，劳动如何才能摆脱资本的统治呢？马克思的回答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3](P570-571)}也就是说，只有颠覆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颠覆资本借以实现统治的资产阶级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劳动者才能真正重新驾驭“物的力量”，从而让劳动的潜能充分涌流，并且借助劳动解放开辟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广阔道路。马克思从三元结构论出发，立足无产阶级立场，强调顺应劳动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借助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权力驾驭资本，最终通过劳动者的自由联合，实现“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跨越。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三元结构理论的传承创新

马克思“改变世界”的根本目的就是颠覆“虚假共同体”而建构“真实共同体”。“真实共同体”是“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P53)}。劳动社会化主导社会共同体实践发展是对国家主体化主导和资本垄断化主导社会共同体实践的扬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承发展了劳动社会化主导社会共同体实践发展理念，是“对21世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的原创性贡献”^{[18](P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巩固劳动主体地位，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发展资本、规范资本，推动劳动社会化的当代建构；坚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倡导共建共赢共享，大力推动经济全球化，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一）巩固劳动主体地位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面对世界和平发展和全球严重威胁提出的中国方案，是对人类社会共同理想的历史性创构和推进。它立足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类社会立场，守望“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理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性原则，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造福世界人民。坚持劳动社会化主导社会共同体实践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鲜明的理论立场。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反思人类社会共同体，但囿于伦理共同体的形而上学观念论，最终把社会共同体的主体性指认给国家主体。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确立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思想，从根本上否定了国家主导社会共同体的实践理念。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做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3](P205)}。“积极的方面”在于，异化劳动是市民社会建构的基础；“消极的方面”在于，异化劳动使人的本质丧失，资本家主宰市民社会的发展，劳动者成为市民社会的奴隶、丧失了主体性。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理念坚持了“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的革命性转变”^{[19](P8)}。基于市民社会的共同体受资本垄断化逻辑的支配，基于人类社会的共同体受劳动社会化逻辑的支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旨在化解和克服贫富分化、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20](P42)}问题。当今世界的全球性问题是资本垄断化逻辑的恶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破解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向人类共生共在、整体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最充分、最广泛、最真实的人民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劳动社会化主导社会共同体实践发展，是对国家主体化和资本垄断化主导人类社会共同体实践发展的扬弃与超越。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彰显了中国共产放眼世界的视野和解放人类的情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为价值指引，以劳动社会化主导社会共同体实践，是对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的创新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在治国理政中的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为民造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就是要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理应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保障人民幸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把人民福祉放在首位……让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过上好日子。”^{[21](P9)}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是为人民造福。为人民造福符合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幸福生活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向往和永恒追求，为此，世界各国应当共同“致力于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繁荣、各国人民安居乐业”^{[22](P9)}。

（二）实现劳动社会化主导必须坚持发展资本、规范资本

生产和交往的普遍化是劳动社会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劳动社会化发展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前

提;劳动社会化的具体表现是劳动解放,劳动解放是劳动主体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前提。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强调,劳动社会化主导社会共同体实践重在保证“两个发展”,即“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和“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10](P130)}。劳动社会化主导是实现“两个发展”的前提基础。列宁所开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劳动社会化主导社会共同体实践的典范,但是,后来形成的苏联模式用“国有化”取代了“社会化”、用“国家垄断制”取代了“劳动社会化”。列宁否定“国家垄断制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是最好的办法”^{[23](P63)}。苏联模式的最大弊端是阻碍生产力发展和阻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坚持劳动社会化主导的社会主义社会共同体比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的显著优势在于能够实现劳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劳动者的解放。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走向僵化和解体的根本原因是用“国家垄断制”偷换了“劳动社会化”。坚持劳动社会化主导,才能认清苏联模式的危害,才能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认为,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是“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24](P328)}。“国家垄断制”产生了两大弊端:一是摒弃市场经济,阻塞了生产力的发展;二是摒弃劳动主体地位,打压劳动者、劳动集体和企业的积极性、创造性,阻塞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新中国的成立为劳动社会化主导社会共同体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如何通过国家制度创新来解放劳动、驾驭资本成为历史性难题。这其实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性成果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创造的发展和治理奇迹原因在于打破了国家对生产资料的垄断,积极发展民间资本和引进外资。驾驭资本和利用资本必须避免自发市场经济造成的劳资对立和贫富分化问题。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占主导地位,其结果,自发市场经济产生强大惯性,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和对立。邓小平指出:“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25](P1364)}劳动创造的资本是一种异化的社会权力。“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26](P293-294)}随着这种异化权力的增长,资本必将绑架国家、宰制劳动,全面控制整个社会生活过程。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既要利用资本又要规范资本,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有效驾驭资本。

(三) 以国家治理现代化引领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坚持劳动社会化主导社会共同体实践发展必须发挥国家的作用,但只有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政党取得国家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才能创新国家制度、改革政治体制、克服官僚主义,从而运用国家机器实现劳动解放的目标。马克思强调:“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4](P377)}坚持劳动社会化主导社会共同体实践并不否认国家在社会共同体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是劳动社会化主导社会共同体发展的根本保障。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必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紧密关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国家创新战略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战略高度耦合,国家繁荣、民族复兴与人类共同福祉紧密关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国家治理战略在全球治理中的表达。“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27]中国秉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理念,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维护国际社会公平正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旨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制度支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在改变国际治理模式的弊端,解决全球治理的“公平正义赤字”焦虑。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高度的耦合性。从价值目标看,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为了推动公平正义的整体性发展。公平正义的整体性发展是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期盼,是中国制度的内在要求和作为负责任大国履行国际责任的自觉抉择。中国大力倡导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8],坚决反对损人利己、以邻为壑和牺牲别国利益以谋求自身发展。

从国际关系来看,全球政治多极化表现为治理主体多元化,尤其是国家主体之外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 etc 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多元主体共存的治理格局充满利益冲突、意识形态竞争、权力争夺甚至战争冲突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多元并存、开放包容、和谐共生理念,致力于谋求各治理主体的利益最大公约数。从权力运行看,政治权力具有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双重职能。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不仅源于政治统治功能,而且源于社会治理功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劳动社会化立场和人民主体性地位。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大战略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权力观,在政治权力运行中坚持为民所赋、为民所用、为民造福的原则。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当避免不同国家制度的冲突与对抗,促进不同国家制度的统筹与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是“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国家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利”^[29]。世界不同的国家制度设计都有自身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智慧,特别是那些存在多种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制度设计,其经验和智慧有利于中国完善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国两制”等。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可以“引入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治理的相关经验,用以发展国内治理的公益组织等”^{[30](P36)},同时,应当及时总结中国基层自治、精准扶贫、德法共治等国家治理先进经验,用以引领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参考文献

- [1]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2]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6] 孙承叔.资本与历史唯物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 [7] 宫敬才.试论马克思市民社会问题研究的结果[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 [8] 王东.中国道路哲学创新的源头活水——《资本论》中蕴涵的“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0]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5] 吴荣,高惠珠.“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超越——基于马克思劳动理论的视角[J].财经问题研究,2019(6).
- [16] 孙琳.“劳动社会化”:被隐匿的场域逻辑——马克思“物化-异化”理论再探[J].哲学动态,2017(7).
- [17] 梁树发.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个维度[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3).
- [18] 刘同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J].中国社会科学,2018(7).
- [19] 王公龙.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世界历史视野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8(6).
- [20] 杜黎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人民性特质[J].人民论坛,2020(24).
- [21] 习近平.同舟共济创造美好未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Z].国务院公报,

2018,34.

- [22] 携手共进 合力打造高质量世界经济——习近平主席在 G20 领导人峰会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和贸易问题的发言[J]. 商业文化, 2019(21).
- [2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全集(第 4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 [2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 [2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7] 金灿荣.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担当[N]. 解放军报, 2019-12-11(4).
- [28] 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 人民日报, 2019-11-06(4).
- [29] 习近平. 弘扬传统友好 共谱合作新篇——在巴西国会的演讲[N]. 人民日报, 2014-07-18(3).
- [30] 潘坤.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耦合性研究[J]. 云南社会科学, 2020(4).

A Theoretical Source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 and Engels' Theory of Ternary Structure of Social Community

LI Wei-yi, YAN Shu-shan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reated a community practice with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and world significance. The ternary structure of “labor, capital, and state” determines the social nature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community. Marx and Engels criticized the autocratic hegemony led by the state’s subjectivity and the capital logic led by the monopoly of capital, exposing the internal division and crisis of the “illusory community”.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 socialization contains the power to subvert the rule of capital,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labor socialization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production materials is the driving mechanism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true community”. In this way, labor can only re-control the “power of things” with the help of the state, that is, deprive the deprived, vigorously develop the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dictatorship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true community”. 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 and Engels’ practical concepts that labor socialization leads social community. Therefore, to achieve the construction, we should adhere to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concept, consolidate the status of labor, and liberate and develop productivity; develop and regulate the capital, improve the ability to control the capital, and promote the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labor socialization; modernize national governance, advocate co-construction and win-win sharing, promot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safeguard international fairness and justice.

Key word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tate subjectivity; capital monopoly; labor socialization; ternary structure theory

(责任编辑 孙 洁)